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清儒之道

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
论辩与践行

张昭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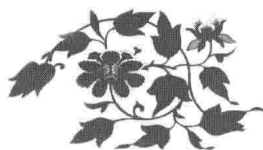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张昭军 著

清儒之道

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论辩与践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儒之道：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论辩与
践行 / 张昭军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9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1-0764-8

I. ①清… II. ①张…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清
代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6408 号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

清儒之道

——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论辩与践行

著 者 / 张昭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 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51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764-8

定 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北师大历史学院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镇，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在北师大历史学科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举足轻重。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全国高校最早设立的学科点之一，在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下，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科建设长足进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方重镇。该学科点是国内最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单位之一，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的首批校级重点学科之一。

近年来，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这些成果，繁荣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园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学术探索无止境，作为探索旅程中的专业研究成果，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1年3月

目 录

序章 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

- 以学派的裂变为线索····· 1
- 一 “各弘其道”与“定理学为一尊”····· 2
- 二 汉学之道与清学之道····· 4
- 三 途穷思变与今文经学之道····· 8

第一章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

- 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12
- 一 “先儒”、“后儒”之辨····· 13
- 二 “太极”、“理”与“天主”····· 22
- 三 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在欧洲的传播····· 27

第二章 西学东渐与理学名儒的回应

- 以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考察中心····· 30
- 一 西教、西法一概排斥····· 30
- 二 排斥西教而节取西法····· 36
- 三 推崇西教····· 45

第三章 义理与考据之辩

- 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评与反思····· 49
- 一 驳斥清代汉学家的新义理学说····· 50

二 指摘汉学家的治学原则和方法	54
三 回应汉学家的经学辨伪	58
四 指责汉学无实无用	60

第四章 兼采与会通

——晚清时期的汉学宋学调和论	64
一 宗宋学而不废汉学	64
二 主汉学而兼采宋学	68
三 会通汉学与宋学	72

第五章 义理、考据、词章与经济

——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	77
一 绍述程、朱，以义理为本	77
二 “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82
三 “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	84
四 “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	88
五 义理、考据与经济，则一秉乎礼	90

第六章 从复“义理之常”到言“义理之变”

——清代今文经学家与程朱理学关系辨析	94
一 兼尊程朱学说	95
二 有调和有批评	98
三 讥诋排斥	100
四 扬弃与新造	106
五 求道与叛道	112

第七章 抉破网罗与守卫天理

——新思潮与程朱理学之冲突	114
一 程朱理学的礼教化	114
二 新思潮对程朱理学之冲击	120
三 宗理学者对新思潮之回应	130

第八章 政学交困

——程朱理学在清代的衰落·····	151
一 敦守纲常与清代理学的教条化·····	152
二 汉学家以考据之功破宋学之理·····	157
三 反对王学与清代理学的空心化·····	163

第九章 离经叛道

——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士人阶层的分流·····	167
一 士人从政·····	168
二 士人从商·····	174
三 士人从军·····	176
四 转向新学界·····	179

第十章 儒家文化在近代的失落与转生

——以礼为例·····	190
一 天崩地解：礼秩的丧失·····	190
二 礼崩乐坏：礼教的衰败·····	193
三 道不在兹：礼义的败落·····	196
四 凤凰浴火：礼的转生·····	200

第十一章 20 世纪上半期的清学史研究

——兼及科学“范式”的局限性·····	205
一 启蒙主义者的研究·····	206
二 新人文主义者的研究·····	211
三 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	216
四 余论·····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24
-------------	-----

索 引·····	235
----------	-----

后 记·····	238
----------	-----

序章 清代学者关于儒家之道的探寻

——以学派的裂变为线索

清代儒学如同历史上儒学各派的大汇演，汉学、宋学，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竞相登场。各学派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尤以汉学与宋学的关系引人瞩目。尽管有学者主张清代只有“清学”，但落诸操作层面，离开“汉学”、“宋学”等范畴实难说清“清学”。按刘师培的说法，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清代。“武进臧琳闭门穷经，研覃奥义，根究故训，是为汉学之始。”^① 清初学者臧琳首先把自己的经学研究定名为“汉学”。清中叶以后，“汉学”、“宋学”的说法相当流行。^②

儒学各派在清代的登场，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文艺复兴”。它是清儒在既对现实政治不满，又受社会危机所迫下被动选择的结果，是拿不出救世良策下的无奈之举。清儒研究的是“圣人之学”，着意的是现实，核心是对“道”的探讨。此“道”是“圣贤之道”，也是现实道路。长期以来，学界比较多地从知识（knowledge，academic）层面来理解和考察清代学术。本章则拟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重点探讨清代各学派在儒家之道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韩愈《原道》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③ “道”兼体用，有学有术。把“学”与“术”结合起来分析清儒之道，可以看到，清代学派的分化和

① 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77页。

② 清儒以训诂考据本于汉儒，故名之曰“汉学”；以义理性道阐自宋儒，故名之曰“宋学”。这里的“汉学”，特指清儒之考据学，并不是汉儒之学。与“汉学”一词相对的“宋学”，特指清儒之理学，也不等同于宋儒之学。

③ 韩愈：《原道》，童第德：《韩集校注》（上），中华书局，1986，第400页。

增多并不意味着每转益进，而是途穷后的回顾，属于被动选择。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清儒拿不出良策，只好返身向后，向古人古书寻求答案。清初黜阳明学而尊朱子学，清中期宋学衰而汉学兴，清晚期于汉于宋皆不厝意，而出现今文经学和汉宋调和论。各学派虽然在研治古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将儒家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没能为现实社会找到一条可行之路。清代各学派向古学中求索“圣贤之道”，屡试屡败，充分暴露了儒家文化的弱点，说明儒家文化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一 “各弘其道”与“定理学为一尊”

明清鼎革，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路向。“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令士大夫痛彻心骨。受此绝大刺激，气节之士在政治上拒绝与清廷合作，在学术上反省明朝灭亡的原因，努力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清初学风，由晚明王学末流之空疏，丕变为讲究经世致用之实学。王国维将清初学术的特征概括为“经世为体，经史为用”，堪称言简意赅。从学派的角度分梳，清初主要有阳明学派和程朱学派。阳明学派势力犹在，如孙奇逢、李颀、黄宗羲被时人称为“三大儒”。孙奇逢等人未染王学末流“游谈无根”等陋习，注重经世致用，并汲取其他学派之长。程朱学派在继承明代学术传统基础上，做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改进。顾炎武、陆世仪、张履祥、王夫之、陆陇其等程朱理学尊奉者，惩于晚明学术“空谈误国”，主张正本清源，明辨程朱与陆王学术异同。整体上看，清初学界，王学后劲多兼采程朱，尊程朱者多贬黜王学，从而呈现阳明学派衰落而程朱学派壮大之势。

历经丧乱，清初诸儒对儒家之道的理解明显分化。如陆世仪、张履祥、陆陇其、吕留良等恪守程朱之道和纲常名教，以程朱之是非为是非。黄宗羲、唐甄、傅山等则质疑儒家纲常学说，对君主专政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颜元既反对陆王，又反对程朱，主张“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① 致力于实体实行之学。钱谦益、费密等对程朱理学深致不满，主张“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惟经存之，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

^①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第774页。

推崇汉唐经学。^① 顾炎武鉴于理学空疏之弊，特强调道问学，提出“经学即理学”，客观上开启了清代考证学一路。值得肯定的是，清初诸儒对“道”的理解虽然不同，但一般能做到身体力行。他们无论居位高低，皆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鞠躬尽瘁，为民族为国家谋出路。黄宗羲说：“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② 这段话可作为清初士人精神的写照。诸儒各弘其道，显示了变乱时期儒家之道的分散，又蕴含着未来之道的可能走向。

至康熙朝，清廷提倡“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定理学为一尊，清代学术格局渐次分明。康熙帝尊崇儒学，尤推崇程朱理学。他把程朱理学列为官方哲学，理学获得了“正学”地位。两相比较，陆王心学受到冷落，逐渐式微。

理学跃居官学，产生了两方面效果。从正面讲，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汤斌、陆陇其等一大批理学人士得到提拔重用，他们以名儒兼名臣，壮大了理学的声势。当时，无论官方、民间，均不乏理学的笃信者。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理学人士的分化，埋下了理学衰落的种子。康熙帝提倡理学，看重的是“御用之术”。他用理学来笼络人心，宣扬纲常名教，而明确反对学理上的探讨。他周围的所谓理学名臣，诸如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讲的也是政治儒学。这批人把理学作为服务君主统治（而且是外族）的工具，与清初大儒的理学精神有很大不同。而且，程朱理学在政治上的独尊，强化了理学人士固有的宗派意识和保守性格。他们指斥佛、老、陆、王为“异端”、“外学”，要求完全遵从程朱学说。他们声称，“圣人之道”经程朱阐发已无遗韵，后人只需学习和接受程朱的结论。如张伯行多次说：“内圣外王之道，灿然著于六经，折中于四子，而发挥阐释于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有志圣贤之学者，惟取六经、四子与夫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虚心学问，俯焉日有孳孳，而著书立说，不惟不可，亦

① 费密：《道脉谱论》，《费氏遗书三种·弘道书》卷上，大关唐氏成都刊本。

② 黄宗羲：《朝议大夫奉敕提督山东学政布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金事清溪钱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41页。

不必也。”^① 理学与权势结合，科举以理学选才，导致理学队伍中增加了大批趋炎附势之徒。与此相对，一些不屑与清廷为伍的理学人士，选择了远离政治，埋头著述，推动了考据学风的兴起。一些坚持反抗清廷的学者，限于政治高压，转而激烈批判理学。他们反理学，实则是反清廷，通过反对为清廷张目之理学来发泄不满。还有一些学者，虽与清廷合作，但对理学持鄙夷态度，他们通过经籍的考辨等方式来揭露理学空疏寡陋的“真面目”。如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易图明辨》、毛奇龄《四书改错》等，无不严重损伤了理学的学理基础。

二 汉学之道与清学之道

乾隆中叶，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是清代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清代汉学历经长期积累，至此达到鼎盛。四库馆聚集了戴震、纪昀、朱筠、周永年、邵晋涵、任大椿、金榜、王念孙等一批著名学者，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由于获得了官方支持，汉学得以与宋学分庭抗礼。清代学术分裂为宋学、汉学两大阵营。

宋学仍居“正学”之位，但不复成军。所谓的理学名臣，仅有陈宏谋、朱珪、尹会一寥寥几人。有人称，“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讪笑”。^② 理学在理论上没有创新，陈陈相因，沦为官样文章和晋身之资。陈宏谋不由发出感慨：“每见著述家多以理学自负，而无裨于实用，理学竟为天地间无用之人，学术不明，为世诟病，可为浩叹。”^③ 朱珪在庙堂大讲理学，晚年却嗜仙理佛。颓势难挽，翁方纲等较为开明的学者，转向汉宋兼采，取长补短。理学不能维系社会信仰，难以满足统治者需要。在此状况下，乾隆帝调整文治政策，主张兼采汉、宋，以汉学辅助宋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说：“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

① 张伯行：《思辨录辑要序》，见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724册，第2页。

② 姚莹：《复黄又园书》，《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外集》卷1，同治六年刻本。

③ 陈宏谋：《王丰川先生续集序》，《培远堂文集》卷1，《陈榕门先生遗书》，民国三十二年广西省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印本。

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① 这不能简单地视为汉学家一家之言，而是代表了官方的态度。“铲除畛域”，“一本至公”，为清廷所用。

汉学则跃居清代学术主流，几乎占据学界全部势力。故后世学者每每以汉学考证来界定清代学术，称之为“正统派”。汉学一家独大，但并非整齐划一。章太炎、梁启超等在前人基础上明确提出吴、皖两派说。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把汉学划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和“虚诬派”四派。此外，又有浙东学派、扬州学派等提法。以人物言，无疑以惠栋学派和戴震学派最具代表性。

汉学的风格，与宋学比较而易见。清代之宋学，是顺着宋元明而来。清代宗理学者恪守宋儒程朱之道，在治学、修身、治国方面是统一的，至少形式上如此。换言之，他们是沿着宋元明之道路继续前行，守成而非独辟，历史与现实一以贯之。汉学则不然。汉学之所以为汉学，从名义和动机上说，是要改换轨辙，改宗汉儒，走汉儒之道。就儒家的理想而言，道、学、政一体，此道至少涵括治国之道、修身之道和为学之道。走汉儒之道，意味着在治国、修身和为学等方面以汉为法。以惠栋为代表的清儒标举汉学，即以此为逻辑起点。惠栋认为两汉经学在佛学兴起之前，去圣贤最近，纯粹当尊。他弃宋尊汉，于宋元以下学说一概排斥。确如梁启超所说，惠栋治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唯问“汉不汉”，以“古今”为“是非”标准。^② 惠栋一派不仅自居于汉学正宗，而且要把汉学立为儒学正宗。他的再传弟子江藩编《国朝汉学师承记》，不仅排斥宋学，且几将顾炎武、黄宗羲等汉学前驱摈而不录，明确表露出该派自居正统的“初衷”。^③ 钱穆说吴学是由反宋学起家，“以徽学与吴学校，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④ 可谓至论。该派的弊病，《四库全书总目》已明确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的古，其短

① 《经部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1，中华书局，1965，第1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31、33页。

③ 江藩不以顾、黄居汉学之首，源自吴派的正宗观念。惠氏曾明确说：清初学者“非汉非宋”，思而不学，学而不纯。见惠栋《本朝经学》，《九曜斋笔记》卷2，聚学轩丛书本，光绪二十九年贵池刘氏刻本。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354页。

亦在于泥古也。”^① 惠栋一派博古而不通今，他们所主张的“汉儒之道”在社会中难以落实。例如，他们的治学便与自身的修行相悖。他们一边否定宋儒的性理之学，一边运用宋儒的修身之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惠氏家族的这副名联，可以说是当时众多汉学家的写照。

青出于蓝，后胜于前。戴震一派尤其是戴震本人，在清代汉学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梁启超甚至认为，“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② 有别于惠栋一派“弃宋宗汉”，“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③ 章学诚《书〈朱陆〉篇后》称：“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④ 戴震受学江永，江永治汉学兼综朱子，故戴震对程朱理学理解较为深刻，而不像惠栋一派轻易予以否定。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⑤ 职是，他的学术思想始终带有和会汉、宋，兼取二者之长的特点。一方面，他继承惠栋的治学门径，重视故训和实证，从而避免了宋学空疏之弊。他明确提炼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⑥ 但他又不像惠栋一派佞汉、泥古，而是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戴震的考证方法类于近代历史科学的归纳法，较为客观平易，与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极相似，而异于含有宗教意味的注经解经。另一方面，较之惠栋一派偏嗜考据，他重视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结合，尤其强调义理的重要性。他反对为考据而考据，曾以轿夫喻考据，以轿中人喻义理，指出不要把轿夫误作轿中人。戴震不以考据为目的，故能比一般汉学家走得更远。他所著《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都是以义理为归宿的代表作。由考据而明义理，戴震走的是不同于宋儒的寻求义理之路，得出的也是不同于宋儒的答案。因为是用近乎史学的方法治经学，故他得出的义理带有世俗化或者说祛魅倾向。例如，他对核心范畴“道”、“理”的理解明显不同于宋儒。朱熹从形上本体来理解

① 《左传补注》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29，第242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4页。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3页。

④ 章学诚：《书〈朱陆〉篇后》，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133页。

⑤ 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2010，第373页。

⑥ 戴震：《与是仲明书》，《戴震全书》（六），第368页。

“道”、“理”，谓“道即理之谓也”，理者性道之统挈。戴震则以“气化流行”来解释“道”，以“密察条析”来解释“理”，以“气在理先”来解释宇宙之本原；又从人伦日用来界定“理”、“欲”关系，主张“天理”、“人欲”的统一，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圣人之道”。^① 所以，钱穆尽管不以戴震立异程朱为然，却欣然承认，戴震治学“极平恕，还是同情弱者，为被压迫阶层求解放，还是一种平民化的呼声”。^② 联系现实世界，戴震敏感地觉察到“天理”与“人欲”之冲突，当道者无不奉理学的“存理去欲”说作为戕害人性的正当工具，从而提出了宋学家“以理杀人”的惊世之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③ 无论理论还是现实，戴震所主张的都是一条既异于宋学，又别于“专门汉学”的道路。梁启超说“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并非汉学”，^④ 于斯可征。简言之，戴震所探索的是一条非汉非宋的新路。

不过，戴震的义理学说在当时仅得到洪榜、焦循、凌廷堪和阮元等极少数学者的支持或继承。戴震之所以被奉为汉学大师和皖派核心人物，凭借的是其经史考据成就。章学诚洞察到：“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⑤ 汉学考据风气下，戴震的义理新路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当然，其理论方法本身也有局限。戴震强调“圣贤之道”存乎古经，经非故训不明，故训是获得“圣贤之道”的唯一途径。这就夸大了考据学的作用，限制了自身获取义理的其他途径。正如方东树所指出：“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⑥ 由于强调义理尽出于考据，意味着一以古圣贤是从，不敢“以自为创而通其变”，^⑦ 束缚了创新活力，

① 戴震：《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书》（六），第159页。

②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第7页。

③ 戴震：《与某书》，《戴震全书》（六），第479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3页。

⑤ 章学诚：《书〈朱陆篇〉后》，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132页。

⑥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收入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第334页。

⑦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46页。

结果是历史禁锢了现实。钱穆论乾嘉学术时指出：“清儒之‘求是’，乃自限于求古经籍之是，非能直上直下，求人文社会大道之是，非能求当身事为之理之是，亦未可谓之求人心之是。而舍乎人心，舍乎当身之事为，舍乎人文社会之大道，更何所谓‘实事’？”^① 乾嘉学术之偏陷，作为主帜的戴震在所难免。与其他汉学家一样，他过于看重书本知识而轻视社会实践，研寻历史上的“圣贤之道”胜过对当前现实社会的关切。这些都决定了戴震及乾嘉汉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道路。

三 途穷思变与今文经学之道

嘉道之后，民变四起，外力交侵，社会局势急转直下，历史亟须有识之士拿出对策，指明出路，摆脱危机。世变引发学变，学术风尚和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作为清代学术最为主要的两派，汉学式微，宋学“复兴”。盛极一时的汉学由于远离现实，无济世用，颇受时人指责。在此背景下，宋学被作为解危纾困的思想学说，再次受到官方和一部分人士的重视。客观地说，程朱理学对于维护清廷的专制统治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光绪中叶，曾廉对此总结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鑫、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② 但对此不能夸大。唐鉴、倭仁、曾国藩等人主要是利用理学来教化民众，敦守纲常伦理，加强社会控制，在理论上并无创新。倭仁曾在日记中写道：“孔门大路，经程、朱辨明后，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③ 这不仅是倭仁个人的心声，而且反映了当时宗理学者的普遍心态。倭仁等人匍匐于程朱脚下，对于汉学、心学等异己学说，无不顽拒固斥。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昧于世界大势，无视社会历史环境的巨变，疾视新思想新学说，盲目排

① 钱穆：《孔学与经史之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第256页。

② 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493页。

③ 倭仁：《日记》，《倭文端公遗书》卷4，光绪二十年山东书局刊本。

外。清代晚期，在西潮的冲击下，宗理学者的迂腐无能暴露无遗。理学沦为新派人士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了“顽固”、“守旧”、“迂腐”、“落后”的代名词。伴随清朝覆灭，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程朱之道走到了尽头。

也有人致力于寻找一条不同于汉学和宋学的出路。这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汉宋会通”。清中期汉学兴起后，汉学、宋学争立道统，聚讼不已。一些较为开明的学者痛感汉宋之争有害无益，主张破除门户成见，取长补短。徐世昌《清儒学案》称：“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① 其中，以陈澧、朱次琦、黄式三、黄以周等的“汉宋会通”论最有代表性。陈澧著有《汉儒通义》和《学思录》（后定名为《东塾读书记》），两是郑玄、朱熹，认为汉学含有宋学之义理，宋学未废汉儒训诂考据之传统。朱次琦力主“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② 黄式三父子则提出“礼学即理学”，^③ 倡导以礼学贯通汉学与宋学。从形式上看，会通论者于汉于宋，兼收并蓄，无所偏倚，好像是拓宽了清儒之道。但究其本质，正如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所批评，“会通汉宋”实则是“掇引类似之言曲相附和”，有模棱两可之嫌。^④ 因为无论对于汉学还是宋学来说，“折中”于孔子（或礼学）是以减损各学派内涵和特色为代价的。换言之，“汉宋会通”是将儒学返之朴初而非通于当今，其目的在息汉宋之争，而非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可见，“汉宋会通”并不是一条新道。

另一种是今文经学“复兴”。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汉学、宋学现状，转从西汉今文经学中谋寻经世之道。其始倡者孔广森、庄存与对汉学和宋学的弊病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对当时汉学恒订琐碎、脱离现实的学风尤为不满。他们主张师法西汉之学，摆落名物训诂，直接从《春秋》“属辞比事”、书法条例中寻求圣人的微言大义，借以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嘉道之际，刘逢禄撰《春秋公羊义例》、宋翔凤撰《论语说义》等，大张其军。尤其是刘逢禄，上承董仲舒、何休之统绪，“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

① 徐世昌：《心巢学案》，《清儒学案》（四），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336页。

②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第8页。

③ 详参黄以周《曾子论礼说》，《傲季杂著》文钞一，《定海黄氏遗书》，同治光绪年间刻本。

④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第267页。

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①使《春秋》大义和公羊家法晦而复明。龚自珍推许说：“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②受刘逢禄启发，龚自珍、魏源等人改变治学方向，归宗今文经学。他们把经学与现实直接联系起来，“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开启了“以经术作政论”的新学风。^③梁启超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把公羊学说与西学附会在一起，服务于政治改革的需要。“以经术作政论”的学风，在戴望、王闿运、廖平、皮锡瑞等今文经学者身上均有体现，而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等新学家。从他们的思想主旨看，清代今文经学与汉代今文经学大有不同。清儒面临的局势险恶，急于救世，他们的学术以境遇为转移，“复西汉之古”只是形式而已。在此风气推动下，清代晚期，今文经学家由非议宋学、汉学，进而怀疑古经古史。“凡二千年经说，自魏晋至唐，为刘歆之伪学；自宋至明，为向壁之虚学。”^⑤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反传统的逻辑和学理依据，并非完全来自对儒家传统的系统探研，而是不同程度地接受自佛学、子学和西学等“异端”学说。换句话说，晚清的今文经学者实际上是打着儒家之名行否定儒家之实，玩的是“缘饰经术”。职是之故，他们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蒙文通指出，“刘氏（逢禄）、宋氏（翔凤）喜张皇劭公之义，以遍说群经，自夸今文学，不能究洞经旨……暨乎湘之魏氏（源）、浙之龚氏（自珍），益言无检束，不可收拾，而皆自托于今文。凡诸杂书小记，无不采摭，书无汉宋，惟意所便，于汉师家法破坏无余，则又出刘宋下。”^⑥王国维说：“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⑦钱穆也认为“道咸诸儒要凭经学权威来指导当前”，他们本应于史学中耐心觅取，现在则依凭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

① 魏源：《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242页。

②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347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5、77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5页。

⑤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56页。

⑥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第138页。

⑦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97页。